

·古代文化史知识·

从服饰文化谈谈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陈 小 法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人记载和研究日本的历史也是由来已久^①。从最早《山海经》出现“倭”的记事,到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的《魏志·倭人传》开始,研究日本的史料主要集中在各时期的正史中。到了明代,由于倭寇骚扰、商品经济发展等原因,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日本研究热”,研究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资料也不仅仅限于官撰正史。但是如果细检历代有关的文献史料,不难发现研究者们对于日本服饰文化的重视性。这是因为服饰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民俗事象,更是一种文化动向。通过它可以感悟到某群体在审美意识变迁、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文化类型趋向等等方面的时代气息。因而,它是了解一个民族的一种显在有效的途径。本文以历代中国人记载的日本服饰文化史料^②为基本素材,对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进行探讨。由于元代前后中国人的日本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行文分成“元代以前”和“元代以后(明代)”两部分,恳请大家教正。

一、元代以前

元代以前编纂的正史中,列有“日本传”^③的从最早的《后汉书·倭传》到《宋史·日本国传》为止,总共有十五部,其中的十部或多或

少对日本的服饰文化有所描写。具体情况如下(括号里内容为笔者所加)：

1.《后汉书·倭传》：

土宜禾稻、麻苧、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纷，衣如单被，贯头而著之。

2.《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男子皆露纷，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纷，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禾稻、苧麻、蚕桑、辑绩，出细苧、缣绵。

其年(景初二年)十二月，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文。其四年(正始四年)，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泰始二年)，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

3.《晋书·倭人传》：

其男子衣以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缀。妇人衣如单被，穿其中央以贯头，而皆被发跣足。俗种禾稻苧麻而蚕桑织绩。

4.《梁书·倭传》：

民种禾稻苧麻，蚕桑织绩。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似中国胡公头。

5.《北史·倭传》：

其服饰，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屐形，漆其上，系之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银为饰。故时，衣横幅，结束相连而无缝，头亦无冠，但垂发于两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锦彩为之，以金银镂花为饰。妇人束发于后，亦衣裙襦，裳皆有襞。

死者殓以棺槨，亲宾就尸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

6.《南史·倭国传》：

人种禾、稻、苧、麻、蚕桑织绩。男女皆露纷，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似中国胡公头。

7.《隋书·倭国传》：

其服饰，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屐形，漆其上，系之于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银为饰。故时衣横幅，结束相连而无缝。头亦无冠，但垂发于两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锦彩为之，以金银镂花为饰。妇人束发于后，亦衣裙襦，裳皆有襞。

及葬，殓以棺槨，亲宾就尸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

8.《旧唐书·倭国传·日本传》：

并皆跣足，以幅布蔽其前后。贵人戴锦帽，百姓皆椎髻，无冠带。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束发于后，佩银花，长八寸，左右各数枝，以明贵贱等级。衣服之制，颇类新罗。

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

《旧唐书·日本传》

乃遣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曰“白龟元年调布”。

9.《新唐书·日本传》：

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巾蔽后。贵者冒锦；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至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文布为衣，左右佩银鹖，长八寸，以多少明贵贱。

朝臣真人者，犹唐尚书也，冠进德冠，顶有华鹖四披，紫袍锦带。献大幅布为贄，悉赏物贸书以归。西南直越州，有丝絮、怪珍云。

10.《宋史·日本国传》：

产蚕丝，多织绢，薄致可爱。

纳白细布五匹。红丝、泥障。询其风俗，云妇人皆被发，一衣用二三缣。

熙宁五年，有僧诚寻至台州，诚寻献琥珀所饰念珠，及青色织物绦。

经过对以上史料的梳理,可以发现,随着对日本服饰文化知识的提高,中国人的日本观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1.从《后汉书·倭传》到《梁书·倭传》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中国人认为:日本种植物主要是麻苧、蚕桑,知织绩为缣布;而男人的服饰大都是“衣以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缀”。颇似中国僧侣用的袈裟。对于日本人的这一肖像,在《魏志·倭人传》成书后三百年的南北朝时代,由梁元帝萧绎所编《职贡略》中也可得到进一步证实。该书画有来梁朝贡的各国使节的画像,其中的倭国使节,双手握于胸前,头缠布巾,肩披布和腰缠布都分别系结于前,跣足前行。这一服饰形态,与以上史料中所述的内容非常相似。而妇人则“衣如单被,穿其中央以贯头,而皆被发跣足。”即常说的“贯头衣”。应该说,这一记载的可信度也是比较高的。在奈良县坪井遗址出土器绘上也有贯头衣的图案。又传闻香川县出土的铜绘画上的人物形象,是用三角形来表示,这是为了表现穿着贯头衣的人物姿势。至于“冠”,在《魏志·倭人传》中有“以木绵招头”,即普通百姓都可以戴帽子,到了《梁书·倭传》则有“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似中国胡公头”的记载,可见“冠”不仅在质地、美观程度上都有了很大发展,而且成了身份的象征。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邪马台国在短短的二十七年中,给魏的三次贡物由景初三年(239)的班布(细苧布)经正始四年(243)的倭锦到泰始二年(266)的异文杂锦,这个随时代不同而逐步高级化的过程,使得我们在惊叹日本纺织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日本处心积虑的“事大”之心。

2.从《北史·倭传》到《隋书·倭国传》为第二阶段。和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日本为加强皇室统治、排除豪族力量,使日本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不仅在政治制度上仿效中国,在文化上也直接与隋唐文化相交通。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

地区,任何一个朝代所处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都决定着当地当朝的政治,而政治本身又反过来作用于文化领域,影响服饰发生变化。那么在日本具体表现为:男人的服饰由以前比较随意的“横幅结束相连,略无缝缀”成了“衣裙襦,其袖微小”,即分成了裙子和短袄。富者还穿上了鞋子,形状“如屐形,漆其上,系之于脚”。而妇女的着装也有了很大变化,由原先的“贯头衣”改成了“妇人束发于后,亦衣裙襦,裳皆有襞”。可见,这时期的日本服饰实用与美观得到了进一步统一。至于“冠”,则出现了一种由大王制定并与官衔等级相联系的“色冠”,一般庶民无权使用。虽然在原料上和以前富者戴的没多大变化,仍以“锦彩为之”,但它“以金银镂花为饰”,比以前更富装饰性。从以上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政治上律令制的采用,在服饰上也相应地追随唐服,表现出一定的法度和节奏感,并确定着装限制,认为服饰不可以无分贵贱、随意为之,这也是儒家服饰观的基本准则。但值得注意的是,和其他文化一样,到了日本的唐式服饰,也表现为模仿与创新的高度统一。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色彩禁忌”现象,即用不同颜色的冠代表不同等级的官衔,用白布来制丧服等等。

3.从《旧唐书》“倭国传”与“日本传”到《宋史·日本国传》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人认为日本服饰大致上可以分成普通百姓和高官显贵两大类。普通男子的服饰都以“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巾蔽后”为主。而“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至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文布为衣,左右佩银礪,长八寸,以多少明贵贱”。可见,妇女的服饰在配色、款式以及附件上都有了较大发展,并以服饰分贵贱。而像粟田真人这样的高官,则是“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显得十分华贵,与普通百姓完全不一样。当然,遣唐使的粟田真人之所以如此打扮,除了表示自己的身份外,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用意。元代以前,日本在中国人的眼中那是一个“神仙之乡”、“宝物之岛”、“礼仪之邦”、

“理想的乌托邦”，而那里的人民则大都是“好学之士”、“美貌君子”等等。形成这种观点，在隋唐以前主要是来自各种传闻中的“虚象”，隋唐以后，则主要来自众多遣唐使的“实象”。为了能让日本在众多国家中胜出一筹，日本政府把个人的形象或容貌作为选取使节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种取悦手段也正好迎合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和服饰观。“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一个容貌堂堂的使节再配上华贵得体的服饰，更是相得益彰。事实证明，日本的这种策略确实给唐朝留下了“礼仪兼得的君子之国”之印象，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二、元代以后

自从九世纪末遣唐使的历史落下帷幕，五代及宋元中日之间停止互派政府使节，于是隋唐时期形成的彬彬有礼、孜孜好学、容貌秀美、举止文雅的日本人形象，逐渐化为遥远而苍白的记忆。由于元朝两次征日的失败以及倭寇的横行，中国人的日本观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原先美好的印象变成了凶恶狰狞的倭寇之国。到了明代，这种观点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随着倭寇的肆虐，丑化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称日本人为“凶恶”、“狡诈”、“妖怪”等等，吵架时如拿“倭寇”来骂人那可是最高级别了。本节就以明代人的日本观为中心进行阐述。众所周知，明代中日关系具有很大的一个特点，一方面政府派遣的使节频频往来，他们大都具有以前使节那种博学谦虚、仪礼双全的优点；另一方面是穷凶极恶、好战狡诈的倭寇不断肆虐。以上两方面始终交织，使得中、日两国关系复杂化。然明代这种多重的日本像同样在该时期的服饰文化史料中能够找到折射。

1. 三幅日本人像

到了明代，不仅有大量文献记载日本情况，描绘日本人的美术作品也应运而生。以下就是三幅比较有代表性的日本人像图。

观下页图，《万宝全书》中的日本人像为上半身全裸，跣足，下



图1《万宝全书》中的日本人像



图2《三才图会》中的日本人像



图3《东夷图像》中的日本人像

身着裙,身体肥壮,肩扛凶器,一幅“野人”样^④(图1)。而《三才图会》中的日本人像,就与前者完全不同,图中的日本人看上去一脸慈祥的表情,服饰整洁,脚蹬靴子,双手合拢,一幅彬彬有礼的样子(图2)。但有趣的是,前两幅画像虽然迥然不同,但旁边的注解却几乎一样,都称他们为“倭寇”。第三幅日本人像与图1属同一类型,但从两者的服饰来看,后者遮住身体的部分更多了一些,可见其身份和地位都与前者有着区别;从两者的表情和神态来看,后者显得苍老但更加狰狞和阴险,活生生的一副老奸巨滑样。再从两者的动作来看,前者扛着倭刀正在行走状,而后者却一手持刀一手卷袖,随时准备行凶杀人状。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图2是明代人眼中的日本使者或普通百姓形象,而图1和图3实际上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倭寇形象。换句话说,图1是嘉靖时期骚扰我国东南沿海的倭寇,而图3实际上就是壬辰时期的侵朝大魔头——丰臣秀吉的写照。

如果将以上几幅画孤立起来看,会有一种盲人摸象之嫌,但用联系的眼光看,可以发现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独立,而是有内在必然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人物的两个侧面,是这一时期“半商半寇”、“亦贡亦抢”的日本人狡诈性的真实写照。

关于明代史籍中的倭寇图像,据笔者管见,除了以上所说的两幅外,还有著名画家仇英的《倭寇图卷》。^⑤该画卷中的倭寇下身赤

裸、光头跣足、肩扛刀枪、身缠斑衣、面目狰狞；头目手执扇指挥，兵卒嘴吹螺传讯；群盗放火抢掠时凶相毕现。这些画面同以上两幅画大致吻合，都直观地反映出明人眼中的倭寇形象。

2. 文字史料

明太祖朱元璋在《倭扇行》中有这么一段话：“断发斑衣以为便，浮辞常云卉服多。褶裤笼松诚难验，君臣跣足语蛙鸣。”从这字里行间似乎看到了一个滑稽而又尚未开化的日本人像，因而，这段文字也是对朱元璋“鄙俗”的日本观的一个生动展现。^⑥

诸葛元声在《两朝平攘录》中认为日本人的服饰是：“男女服染青质白纹。男衣过膝面止，女人衣如单被，穿其中以贯头。皆被发跣足，拔眉黛额。”^⑦显然，这里说的是日本普通百姓的形象。实际上这时的日本服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作者仍一味因袭早期史料。这种不思求新、求实的现象，当代作家周作人曾经概括过：“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的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冷静了。”^⑧明代人同样染有这种“风习”，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卷六“日本妇饰”中这样写道：“倭国妇人不裹足，发长，散披在后，至梢皆剪截极齐。服饰有扇子锦。”可见，李诩眼中的日本妇女其飘逸高贵状不亚于国人。

在明代研究日本的著作中，不能不提到的一本书就是李言恭、郝杰合著的《日本考》。在该书中，对日本人的服饰首次作了大篇幅的记载：

男子断发魁头，黥面文身。衣伊襦。横幅结束，皆无缝缀。上古，足多跣，首无冠；中古及今，皆设其履，名曰法吉木那，形如屨，漆其上，面系其足；寒置短袄皮，袜名曰单皮。一身以纸表成，上平天，下横阔，夹青纸一幅，掩其谷道。以布或绸缝成小袋，囊其玉茎，名曰法檀那和皮，上穿其裤，微露夹纸。但遇

时节、会亲友、赴宴，穿方袖长大敞衣，袖下以彩线为襦。若官长，腰用段绢四层缝连一带，阔四寸，长丈余，拴之，名曰和皮，其首戴斜方段帽，若黍角形，名曰蒲西，以线带拴于地阁，因无发，恐冠不正耳。庶人衣服同，无绢，腰用颜色线结成带，阔寸余，长丈二，拴之，亦曰和皮，以便带刀出入之故。凡出，倘遇亲友生者于途，则卸其履，令从者执之跣足而过；无从者，则手携履而行，离其座处始复穿履。若生者见其来，人遂起立，则行入穿履搓掌而过，是为恭敬也。女子富贵者披发屈紒，贫常以发束髻，以便工用。首不用金银为饰，耳无环，梳妆面粉唇脂。富贵以金银造簪，宝物挽发，名曰革眉素若。贫者以铜锡骨用早簪，其名同。手间用戒指，名曰衣皮揩泥。衣如单被穿其中，贯头而着之。短绢衣名曰骨耸地，布曰吉而木那。下身亦衣裙襦，名曰加福。寻常内不着裤，凡出入，庶人之妇无轿，乘马始穿其裤，以备露形。其足不裹，任其生成，亦无脚带缠之。鞋以皮染彩裁条，结如凉鞋，底用皮包席，名曰恭蛾，又曰十吉利。^⑨

从以上的描写可以看到作者眼中的日本乃是一个等级分明、服饰怪异、行为繁缛的民族。

然真正对日本服饰记载最详的应数郑舜功的《日本一鉴》，在该书的“穷河话海”卷三“服饰”中对日本国的长君、亲王、国守、臣民、男女、僧尼、头陀、稚子、戎优等人常用服饰一一作了记载。容不厌其烦引用长文如下：

夷长君妆冠曰大织，节届用之，必衣锦，常衣履与民同，隋炀赐冠去世既远，永乐之世优赐九章，至今称之。夷王妃妆饰，节届衣锦常则俗同。夷亲王妆冠见所顶而忘其名冠已，纯黑样如中国之食面馄饨，节届用之衣履从俗。夷国守妆节届则用束发冠衣履同俗。正德之世周防国守多多良得请遣使入中国时，得冠裳以归，是守敬用之。夷国臣妆节届皆顶束发冠（竹皮为之），衣履同俗。夷男妆节届则顶束发冠，以绳绊之于项，衣无

裙襦，腰束一物以布作纲，于中缀带，阔约四五寸，自腰之后由跨之下兜起，腰前面结之，纲上以掩其根，名曰挈带，一曰根衣。再着长衣，其名直垂，两襟一同无内外别，袖两短小，止肘之前，敛衽从左，以绦束腰，间居则加短裤于外裤，如故人衣。皮在腰以掩前后也。若出门行礼则加短衣于上，以半其身而已，于肩其名曰维，又曰断肩。乃解短裤，更衣长裤于外，其名曰装束。裾拖地曳尘名为礼衣，又以绦束腰间，长短二刀插之左右，刀鞘之旁内一铜器其名曰笄，又插小刀或插双箸，便于食物。不拘冬夏，腰恒佩扇。又多藏纸于襟内，以便唾涕，不致污席。或持数珠为之念佛。履以草作，半于足掌，自底左右缀一横梁于中，中缀一鼻连着底，前约入沿里凡寸许，内于拇指凹间，凡行步跟不着地，兴脚而行。冬衣皮袜而已于踝。若出门足多不袜，以涉溪涧故也。若驾马亦着之，又手衣皮以控。夷妇妆间居螺髻屈纷独簪，而无金银首饰，多用胭脂及黑齿，若闺女多以玄丹抹额为避水妖故也。衣无裨裆有裙襦，横幅结束以缓步。衣长绦束加以锦绣，仍束绦。若出门则多被发，再以衣蒙其头而露其目。冬衣皮袜着皮席履以行之。犯遇节届，多诣佛寺，手搓数珠欠身而退。夷僧妆披剃，冬顶帽，名扁折。本僧所作，喜顶端公帽，为中国之僧制也。衣裤带服长，衣名直裰，向纯素，束腰之绦名平江，加以青夏布衣，衣腰大致名曰折子。恒持数珠念佛。若出门多持扇，着皮席之履而行。若礼佛则服袈裟，加以方心折，那乃着中国僧履而作。若看经或写字，则用小文。凡一等俗人鼓目者，则削发习琵琶为游食僧等。一俗人而身年老、家事丰盈、父母俱亡、儿女事毕、不以俗虑，削发看经以为事。一等游民而惰于栉，削发浪游日惟嗜酒。近有入冠中国者，我误认以为倭僧。夷尼头妆削发衣履妇同，手持数珠，时常念佛。一等俗妇亦有削发看经者。夷头佗妆剪发仍寸许，衣长，衣系黄丝绦，日常丐食，曰喝吃。纪伊头佗而专黷

武，以必胜人为能，不为盗。夷稚子妆如女人，虽不蒙头多赋脂粉，年五六岁多佩木刀，以习技。凡就文学皆不佩刀。夷戎装饰顶铁盔，饰红缨，谓火威。挂铁甲或皮甲，甲饰彩丝。甲惟掩胸，不备于背，盖以殿为耻也。而手足皆有蒙蔽，名曰具足。腰佩长短二刀，恒挥扇或驾马而行。弓矢矛铙之类但有其所能也。夫骑射中国同。若或出猎，手则衣皮，便提鹰鹞织席里胫，其名胫巾，而游猎焉。其优装饰皆从俗，多衣锦，如旦者手鸣柄铃副以羯鼓，妆点汉唐故事翩翩而舞者皆其国都之人。凡游列国搬演嬉戏国守臣民同乐厚赠之。”^⑩

从以上的描写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

- 1.日本人敬重中国服饰并以穿着为荣；
- 2.不同等级、身份、性别的人其服饰有比较严格的区分；
- 3.日本人非常注重服饰的场合性和时节性。

可见，在郑舜功眼中日本国是一个有礼、有节、有序之国。与时人的一般观点（凶狠、奸诈）有着很大不同。由于作者曾亲自到过日本，《日本一鉴》是其访日后的总结，所记内容应该有较强的可信度。随着著作的刊行，其日本观也渐为人知。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研究日本的著作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记载倭寇的。当时倭寇残暴的行为令人发指，这已是众所周知，那么丑陋、凶恶的倭寇究竟是怎样一幅装扮呢？“战士身无甲，冬夏一花布衫，下短裤，轻捷如飞。”“每人一长刀曰佩刀，其刀上又插小刀，便杂用。又一刺刀长尺余，名解手刀。此三者随身必用。”^⑪

可见，一般倭寇身无盔甲，很少穿衣，手提倭刀，再加上“髡首鸟语”，样子确实可怕，难怪老百姓将他们比作魔鬼。相比之下，倭将的打扮就讲究多了：“有乘骑者，有乘舆者，皆衣红衣，其酋长也。”“倭将有衣红衣乘白马者，持双刀冲击。”“一先锋衣红锁金短袄，舞双刀突前。”“贼首号二大王者，躯干魁桀。戴铜兜鍪，衣铜甲，束生牛皮。”“头领间御锁子甲，尤精坚。”^⑫

对倭将的这种装扮，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曾经提到：“夷戎装饰顶铁盔，饰红缨，谓火威。挂铁甲或皮甲，甲饰彩丝。甲惟掩胸，不备于背，盖以殿为耻也。”可见，主要是为了显示他们的威严。

当然，倭寇的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有时“效吾乡民装束，又类吾军装束，混而无别，与我为—。众以为逃窜民也。”“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芟履，荡游于都市。”可见倭寇不仅凶狠可怕，还十分的狡诈。

由于受倭寇特别是嘉靖时期倭寇成分复杂性^①的影响，明代人的日本观也是变化多样的。“良民畏倭而奸民习倭；上之人惕倭之来而下之人引倭之至。”^②正如以上所说，从不同的阶级或立场出发能引出迥然的结果，所以在探讨明代人的日本观时要谨防模式化和单一化。如概括起来，笔者认为主要有这么几种：①“畏恶观”，以身受倭患之害的民众为主。认为日本国就是倭寇国，其国狭小，其民狡诈、残暴；②“藐视观”，以文人将士等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为主。认为其国小且鄙俗，对堂堂大明反为小日本所患，感到不可思议；③“辩证观”，以少数对日本具有相当研究的人为主。如抗倭幕僚郑若曾就是其中之一。^③主要特点是能相对客观地认识到日本国情以及它与倭寇的关系。

注：

①日本大宫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大宫真人在其著作《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一书中指出，屈原在其流放期间曾到过日本九州的大分县。经大宫真人考证，《离骚》、《天问》和《九章》中的《惜诵》、《抽思》等篇，记载了日本的许多地名，而且《离骚》是屈原登上九州之后的第一篇作品，因为《离骚》一开篇就记载了两个登陆地点，而后，屈原将自己所到的村落，按先后次序记入了《离骚》和其他作品。综观大宫真人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他主要以语音对应为论据，显然其力度是不够的。但是为后人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上，有一种启发性作用。

②本文所说的服饰文化系指与人类的衣着穿戴有关的文化综合。

③正史中作“日本传”的有《旧唐书》、《新唐书》、《元史》、《新元史》、《明史》;作“日本国传”的有《宋史》;作“倭传”的有《后汉书》、《梁书》、《北史》;作“倭人传”的有《三国志·魏志》、《晋书》;作“倭国传”的有《宋书》、《南齐书》、《南史》、《隋书》、《旧唐书》。本文所引用的有关史料均出自中华书局版。

④此处“野人”指的是生活在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东北之间的女真族。由于朝鲜也信奉儒学,其华夷意识比起中国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他们眼里,当时的“野人”和“倭人”犹如禽兽,而在早期,“倭人”甚至比“野人”还低一等。参见(日)村井章介《中世倭人传》“野人と倭人”条。日本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3月,59页。

⑤旧题《明仇十洲台湾奏凯图》,经学者考证定名为《倭寇图卷》。长522厘米,宽32厘米,绢本著色。画面分倭船出现、倭船登陆、形势观望、掠夺放火、明人退避、与倭交战、胜报、官兵出击八个部分。现藏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有复制本。

⑥王勇:《中国史の中の日本像》(日文版)。(日)东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发行,2000年9月,207页。

⑦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收录于《壬辰之役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7月,4~5页。

⑧周作人:《周作人文选·杂文》。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年1月,114页。

⑨李言恭、郝杰:《日本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4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4),75~77页。

⑩郑舜功:《日本一鉴》。1939年据旧钞本影印,“穷河话海”卷三4~5页。

⑪⑫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8月,153~157页、146页。

⑬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国内可以参见郑樛生的《明代中日关系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3月),国外可以参见石原道博的《倭寇》(日本:吉川弘文馆新版,1998年3月)等。

⑭王在晋《皇明海防纂要》“序”。万历四十一年初刊,扬州古旧书店复印边疆图籍之一。

⑮有关郑若曾的生平及其日本观请参见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人郑若曾的日本研究》,2001年12月。

作者工作单位: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钱潮分院